



抗战时期的重庆《大公报》馆

抗战时期的重庆《新民报》社

# 宋育仁创办重庆第一家报刊 抗战时期山城有报社逾百家

——重庆报业史话

□杨耀健

## 1 《渝报》创刊 报业发端

1897年,维新派宋育仁仿照梁启超所办《时务报》,在重庆创办《渝报》,这是重庆的第一家报刊。宋育仁任社长,主笔和副主笔都是重庆书院教师,进步知识分子。

1902年,《天公报》创刊。1903年,革命党人朱蕴章、杨庶堪创办《广益丛报》。这些报刊以政论为主,新闻很少。书生办报,直言谏论,志士匡时,关心民瘼。但由于使用文言文,深奥难懂,读者局限于士绅和学子。

1904年,卞小吾创办民营《重庆日报》,每天出一张,始具有现代报纸模样。1905年,重庆总商会自办《商会公报》,除在商言商外,当然也有时论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《国民报》《益报》面世。此后,《重庆新中华报》《正伦日报》《国民共济报》《西方日报》《普通白话报》先后创刊,重庆总商会机关报《商务日报》则脱颖而出。接踵而至的有《渝州日报》《民苏日报》《女铎报》《四川盐务公报》等,或主张民选,或张扬琐事,或争取女权,或鼓吹盐政改革,喧嚷嚷嚷,好不热闹。这些报纸绝大多数是民营。

“五四”运动后白话文兴起,当局加以推广,然而多家报纸的主笔都是旧学堂出身,虽以白话行文,笔下仍不免掺杂文言气息。于是,茶馆里出现了读报先生,自己先读一段,然后解释给竖着耳朵听的茶客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随着市民文化程度提高,报业迅猛发展。《民治日报》《平民日报》《工务日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万县日报》《四川公民日报》《公益晚报》《团信日报》《新新日报》《中山日报》《锁闲日报》《重庆民报》《新民日报》《合川日报》《嘉陵江报》《川康日报》,以及限于篇幅未列名的报纸陆续登场,已达数十家之多。其中最著名的是《新蜀报》。

1921年2月,陈愚生发起创办民营《新蜀报》,社址在白象街。报社初期有三位得力主笔:陈毅、肖楚女、漆南熏,不仅会编辑,自己也能写很漂亮的文章,夹叙夹议,抨击帝国主义,揭露时弊。在此期间,《新蜀报》成为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的重要阵地。

## 2 报社云集 读者拥趸

抗战期间,全国主要大报迁渝,诸如《中央日报》《扫荡报》(后更名《和平日报》)《新民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大公报》《益报》等。中共《新华日报》也迁到重庆,像一颗星火,映入大后方读者迷惘的瞳仁。众多沦陷区报纸也在此复刊,大量行业报、机关报涌现,民间自办小报多如牛毛,水漫金山,此起彼伏。据统计,时有大小报纸逾百家,从业人员数千名。

这时的报纸突出新闻性,举凡世界局势、前方战况、物价升降、婚嫁讣告应有尽有。各报均采用白话文写作,通俗易懂。记者贴近时事新闻,开阔视野,他们功底深厚,思想文采均大有可观。一些大报还办起副刊,诗歌散文、小说连载,夺人眼球。城内报童报丁成群,满街叫卖。固定订户则由专人送报上门。



重庆《新华日报》门市部

那时收音机是洋货,市民买不起,获得资讯全靠报纸。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报纸,走出门去买一份,找个地方落脚慢慢享用。无钱购买者,凑上前来瞄着看,报主并不嫌弃,相熟者则互相交换着看。没有报纸消息作为谈资,茶客们坐在茶馆里相互就无话可说。当时报纸几分钱一份,所以购买者甚多。读过的报纸有专人回收,供小商小贩裁成纸片,用以包装瓜子、花生、红苕干、爆米花等小食品。

遇有重大新闻,各家报纸销量猛增,很快售罄,一报难求。据文史老人回忆,太平洋战争爆发、中美、中英签订新约、抗战胜利、国共重庆谈判、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,报纸都很抢手。街头设立的读报栏前人头攒动,挤进去相当费力。

## 3 记者采访 跑断脚杆

新闻是报纸的主要支柱,为提升可读性和销量,重庆各报社都注重采访,有些报社还向外地派出记者,或在外地聘请特约记者,增加消息来源。

《新民报》拥有记者十多名,算较多者,分工细致。每人跑指定行业或单位,如遇重大事件,则集中更多记者前往采访。《大众晚报》是一家小报,记者仅3人,胡子眉毛一把抓。

在光鲜的外表下,记者这碗饭其实不大好吃。各报社要求记者每天向编辑部交一定数量的稿件,又没有交通工具,自行搭公共汽车、人力车,或是徒步采访。报社还规定记者不得在外兼职。

没有新闻线索,没有人爆料,全靠记者自己去寻找,大家习惯按分工去坐鱼龙混杂的茶馆。跑经济新闻的,要去粮业、屠宰业、油脂干菜业、布匹业等行业帮茶馆;跑社会新闻的,要去“长亭”“娱乐”“江山一览轩”“葛岭”等茶馆;跑刑事案件新闻的,必去响水桥口徐姓茶馆;跑文艺新闻的,必去“周员外院子”“中二路”“青风”等茶馆;跑时事、政治的记者,则必须去两路口国际宣传处。自己找到线索,又得去进一步采访、写稿。早上八九点钟出门,晚上八九点钟必须交稿,否则后果不好说。

老报人姚江屏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《新民报》的待遇不算菲薄,可是发给的车马费只够坐几趟公共汽车,从市区到化龙桥、沙坪坝,连马车也坐不起,几乎都是靠两条腿。金融行情时间性强,我早晨七点半以前必须从安乐洞住处赶到陕西街,有六七里远,除了春节三天不开盘,我没漏过一天。旧社会仅靠工资,又有拖累,生活的艰苦,绝非今日年轻新闻同行所能想象。”

老记者邵加陵回忆道:“《时事新报》当时只有两个外勤记者,我有时一天跑十几条消息,皮鞋跟磨歪

了,也买不起新鞋。如果不是时常参加什么‘敬请光临’的商家推介会,每月五万法币的工资只够填饱肚子、维持生活而已。”

也有轰动的喜悦。1944年夏,《新民报》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,归来写了《延安一月》。同年9月30日起,开始连载发表,并印制成书公开发行,受到广泛欢迎。这是在国统区有系统地报道边区情况的第一本书,《新民报》因之提高了社会声誉和地位。

## 4 发行业务 各显神通

重庆第一家报纸《渝报》的发行方式,是自办与派报相结合,在重庆设零售点,另在成都、宜宾、南充、万县等地设置22个代办处。该报前期发行300份,其后最高发行2500份。

《广益丛报》采取订阅方式,概不零售。该报自办的发行机构,在省内外有40多家,每期发行2000份以上。《重庆日报》初期为赠阅,后来向社会征订,数量从500份增加到3000份。

“五四”运动后,重庆报纸发行进一步改进,方式为自办、邮发、分销处、代销处、零售,以及部分赠阅和交换,不限制发行范围和区域。《国民公报》采取的措施是,市内要求早晨8点前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中,发往外地的报纸必须赶上当天第一班车或轮船;二是扩大外地分销,增加代办人酬金;三是培养一批专业推销员,领证即可卖报。

《新华日报》以编得好、出得早、销得多闻名。从化龙桥用三轮车运出的报纸,不到清晨5点,就已送达营业部。如有重要内容刊出,则会提前至凌晨两三点出报。该社报童匆匆吃完早饭,便各自背上几百份报纸,奔向发行科分配的路段、街道、车站、码头。对于重点订户,由报童专送。著名文化人茅盾和萨空了,都有人专送。

北碚复旦大学学生艾白水回忆说,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约有师生1200人左右,订阅《新华日报》的不下五六百人。而其他报纸的订户,最多不过几十份。复旦大学当时被称为“民主堡垒”,或许这也是标志之一。

## 5 大师办报 各有千秋

《大公报》总编辑张季鸾有一手绝活,就是补白。原来,当时用铅字分格排版,各版字数难以精确预计,可少不可多。大样出来,总是这版缺一小块,那版缺一小块。送给张季鸾审读,他思虑片刻,即可写出一篇相关小文章,填上去后天衣无缝,好似骆宾王草檄,立马可待,犹如关云长斩将,温酒可得。

张恨水任《新民报》主笔,主编该报副刊。他本是作家,选稿偏重练达高华,独树一帜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八十一梦》《魍魉世界》在《新民报》连载,风靡一时,带动该报发行;梁实秋主编《中央日报》副刊,注重可读性,提携了不少年轻作者。他自己也开始写作《雅舍小品》系列散文。

《新蜀报》社长周钦岳,先后任《新民报》总主笔的罗承烈、赵超构,《大公报》继任总编辑王芸生,《时事新报》总主笔张友渔,《新华日报》历任总编辑华岗、吴克坚、章汉夫等,都堪称报界闻人。他们宵衣旰食,兢兢业业,三折肱而为国手,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,有滋有味。

老重庆的大多数报纸恪守天职,顺应潮流,曾为辛亥革命大造声势,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,为民主建国奔走呼号,为催生新中国呼风唤雨,以其不可磨灭的实绩,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(作者单位: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19世纪末,列强虎视眈眈,中国风雨飘摇,志士仁人为唤醒国人,争相发表言论,营造崛起。重庆报业应运而生。

你知道重庆的第一家报刊是何年何月由谁创办的吗?你了解抗战时期重庆有多少家报社吗?